

卷二

热风



I210.4/10

热风

热 风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52049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752049

出版说明

本书收作者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四年所作杂文四十一篇，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此后印行的版本都与初版相同。

热 风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76,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3 $\frac{7}{8}$ 插页2

1980年3月北京第1版 198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0

书号10019·2926

定价0.41元



题 记

现在有谁经过西长安街一带的，总可以看见几个衣履破碎的穷苦孩子叫卖报纸。记得三四年前，在他们身上偶而还剩有制服模样的残余；再早，就更体面，简直是童子军⁽¹⁾的拟态。

那是中华民国八年，即西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对于山东问题⁽²⁾的示威运动以后，因为当时散传单的是童子军，不知怎的竟惹了投机家的注意，童子军式的卖报孩子就出现了。其年十二月，日本公使小幡西吉抗议排日运动⁽³⁾，情形和今年大致相同；只是我们的卖报孩子却穿破了第一身新衣以后，便不再做，只见得年不如年地显出穷苦。

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⁴⁾中做些短评，还在这前一年，因为所评论的多是小问题，所以无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却了。但就现在的文字看起来，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⁵⁾。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则本志具在，无须我多言。

五四运动之后，我没有写什么文字，现在已经说不清是

不做，还是散失消灭的了。但那时革新运动，表面上却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正如笑骂白话文的人，往往自称最得风气之先，早经主张过白话文一样。

再后，更无可道了。只记得一九二一年中的一篇是对于所谓“虚无哲学”而发的；更后一年则大抵对于上海之所谓“国学家”而发，不知怎的那时忽而有许多人都自命为国学家了。

自《新青年》出版以来，一切应之而嘲骂改革，后来又赞成改革，后来又嘲骂改革者，现在拟态的制服早已破碎，显出自身的本相来了，真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又何待于纸笔喉舌的批评。所以我的应时的浅薄的文字，也应该置之不顾，一任其消灭的；但几个朋友却以为现状和那时并没有大两样，也还可以存留，给我编辑起来了。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

但如果凡我所写，的确都是冷的呢？则它的生命原来就没有，更谈不到中国的病证究竟如何。然而，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⁶⁾，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⁷⁾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曰《热风》。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之夜，鲁迅。

注 释

〔1〕 童子军 资产阶级对在学少年儿童进行军事化训练的一种组织。由英国军官贝登堡于一九〇八年创立，不久即流行于各资本主义国家。一九一二年中国开始有这种组织。五四运动期间，有童子军参加散发传单等活动。

〔2〕 山东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召开分赃的“巴黎和会”，中国虽作为战胜国被邀参加，但会议在英、美、法等帝国主义操纵下，公然决议将战败的德国根据一八九八年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在我国山东攫取的各种特权，完全让与日本，而北洋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举国愤怒。北京学生在五月四日首先罢课，集会游行，反对巴黎和会决议，要求惩办亲日派官僚。北京学生的这次斗争，成为伟大的五四运动的开端。

〔3〕 小幡酉吉抗议排日运动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各地爱国群众纷纷开展抵制日货运动。日本驻福州领事馆为破坏这个运动，于十一月十五日派出便衣警察和浪人，殴打表演爱国新剧的学生。次日，又打死打伤学生和市民多人，造成引起全国公愤的福州惨案。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反而于十二月五日向中国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硬说“事件责任全在中国”，要求取缔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小幡酉吉前此曾任日本驻中国的参赞，一九一五年帮助日本公使日置益和袁世凯订立所谓“二十一条”的条约。

〔4〕 《新青年》的《随感录》 《新青年》，综合性月刊，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布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一九二二年七月休刊。《新青年》从一九一八年四月第四卷第四号起，发表关于社会和文化的短评，总题为《随感录》。起初各篇都只标明次第数码，没有单独的篇名，从第五十六篇起才在总题之下有各篇的题目。作者在《新青年》发表这种短评，是从一九一八年九月第五卷第三号的《随感录二十五》开始，到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该刊第六卷第六号的《六十六 生命的路》为止，共二十七篇，后全部收在本书中。

〔5〕 这里说的上海《时报》，应为上海《时事新报》，参看本书《随感录四十六》及其注〔3〕。

〔6〕 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照作者的意思，二者表面上很相似，但实质上是区别的。他在《什么是“讽刺”？》中说：“讽刺作者虽然大抵为被讽刺者所憎恨，但他却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讽刺，在希望他们改善，并非要捺这一群到水底里。”“如果貌似讽刺的作品，而毫无善意，也毫无热情，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也一无可为，那就并非讽刺了，这便是所谓‘冷嘲’。”（见《且介亭杂文二集》）

〔7〕 “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佛家语。北宋僧人道原《传灯录·蒙山道明》：“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南宋岳珂《桧史·记龙眠海会图》又有“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话。

目 录

一九一八年

随感录二十五.....	1
三十.....	4
三十五至三十八.....	11

36、37、38

36、37、38

一九一九年

随感录三十九至四十三.....	23
四十六至四十九.....	38
五十三至五十四.....	46
五十六 “来了”.....	53
五十七 现在的屠杀者.....	56
五十八 人心很古.....	57
五十九 “圣武”.....	60
六十一 不满.....	64
六十二 恨恨而死.....	66
六十三 “与幼者”.....	68
六十四 有无相通.....	70
六十五 暴君的臣民.....	72

六十六 生命的路·····	74
---------------	----

一九二一年

智识即罪恶·····	76
事实胜于雄辩·····	81

一九二二年

估《学衡》·····	83
为“俄国歌剧团”·····	88
无题·····	91
“以震其艰深”·····	93
所谓“国学”·····	95
儿歌的“反动”·····	97
“一是之学说”·····	99
不懂的音译·····	103
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108
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110
即小见大·····	114

一九二四年

望勿“纠正”·····	116
-------------	-----

一九一八年

随感录二十五⁽¹⁾

我一直从前曾见严又陵⁽²⁾在一本什么书上发过议论，书名和原文都忘记了。大意是：“在北京道上，看见许多孩子，辗转于车轮马足之间，很怕把他们碰死了，又想起他们将来怎样得了，很是害怕。”其实别的地方，也都如此，不过车马多少不同罢了。现在到了北京，这情形还未改变，我也时时发起这样的忧虑；一面又佩服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天演论》⁽³⁾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

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的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转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

所以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看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大抵有了孩子，尊为爹爹了，——便可以推测他儿子孙子，晓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

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

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

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所以随便辗转，没人管他，因为无论如何，数目和材料的资格，总还存在。即使偶尔送进学堂，然而社会和家庭的习惯，尊长和伴侣的脾气，却多与教育反背，仍然使他与新时代不合。大了以后，幸而生存，也不过“仍旧贯如之何”^[4]，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

最看不起女人的奥国人华宁该尔(Otto Weininger)^[5]曾把女人分成两大类：一是“母妇”，一是“娼妇”。照这分法，男人便也可以分作“父男”和“嫖男”两类了。但这父男一类，却又可以分成两种：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种只会生，不会教，还带点嫖男的气息。第二种是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

前清末年，某省初开师范学堂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听了，很为诧异，便发愤说：“师何以还须受教，如此看来，还该有父范学堂了！”这位老先生，便以为父的资格，只要能生。能生这件事，自然便会，何须受教呢。却不知中国现在，正须父范学堂；这位先生便须编入初等第一年级。

因为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

注 释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五日北京《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署名唐俟。

〔2〕 严又陵(1853—1921) 名复，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闽侯(今福州)人。清末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一八七七年(清光绪三年)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一八七九年回国后，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等职。甲午(1894)中日战争中国失败后，他主张变法维新，致力于西方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思想的介绍，先后翻译了英国赫胥黎(T. H. Huxley)的《天演论》，亚当·斯密(A. Smith)的《原富》，法国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法意》等书，对当时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但他在戊戌政变以后，政治上日趋保守，一九一五年参加“筹安会”，拥护袁世凯称帝。鲁迅这里提到的一段话，见于严译孟德斯鸠《法意》第十八卷第二十五章的译者按语中，原文是：“吾每行都会街巷中，见数十百小儿，蹒跚蹀躞于车轮马足间，辄为芒背，非虑其倾跌也，念三十年后，国民为如何众耳。呜呼，支那真不易为之国也！”

〔3〕 这里所说“做”《天演论》，是说严复翻译《天演论》，不是完全忠实地依照原文的意思。当时严复自己也把他的工作叫做“达旨”，而不称为翻译。他在该书的《译例言》中说：“词句之间，时有所僭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悖本文。题曰达旨，不云笔译。”赫胥黎(1825—1895)，英国生物学家。他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是一部宣传达尔文主义的书，一八九五年严复将其中的前两篇译成中文出版，题名为《天演论》。

〔4〕 “仍旧贯如之何” 语见《论语·先进》：“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

〔5〕 华宁该尔(1880—1903) 奥地利人。仇视女性主义者。他在一九〇三年出版的《性与性格》一书中，力图证明妇女的地位应该低于男子。

三 十 三⁽¹⁾

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于是讲鬼话的人，便须想一个方法排除他。

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先把科学东扯西拉，属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例如一位大官⁽²⁾做的卫生哲学，里面说——

“吾人初生之一点，实自脐始，故人之根本在脐。……

故脐下腹部最为重要，道书所以称之曰丹田。”

用植物来比人，根须是胃，脐却只是一个蒂，离了便罢，有什么重要。但这还不过比喻奇怪罢了，尤其可怕的是——

“精神能影响于血液，昔日德国科布博士发明霍乱（虎列拉）病菌，有某某二博士反对之，取其所培养之病菌，一口吞入，而竟不病。”

据我所晓得的，是 Koch 博士⁽³⁾发见（查出了前人未知的事物叫发见，创出了前人未知的器具和方法才叫发明）了真虎列拉菌；别人也发见了一种，Koch 说他不是，把他的菌吞了，后来没有病，便证明了那人所发见的，的确不是病菌。如今颠倒转来，当作“精神能改造肉体”的例证，岂不危险已

极么？

捣乱得更凶的，是一位神童做的《三千大千世界图说》⁽⁶⁾。他拿了儒，道士，和尚，耶教的糟粕，乱作一团，又密密的插入鬼话。他说能看见天上地下的情形，他看见的“地球星”，虽与我们所晓得的无甚出入，一到别的星系，可是五花八门了。因为他有天眼通⁽⁵⁾，所以本领在科学家之上。他先说道——

“今科学家之发明，欲观天文则用天文镜……然犹不能持此以观天堂地狱也。究之学问之道如大海然，万不可入海饮一滴水，即自足也。”

他虽然也分不出发现和发明的不同，论学问却颇有理。但学问的大海，究竟怎样情形呢？他说——

“赤精天……有毒火坑，以水晶盖压之。若遇某星球将坏之时，即去某星球之水晶盖，则毒火大发，焚毁民物。”

“众星……大约分为三种，曰恒星，行星，流星。……据西学家言，恒星有三十五千万，以小子视之，不下七千万万也。……行星共计一百千万大系。……流星之多，倍于行星。……其绕日者，约三十三年一周，每秒能行六十五里。”

“日面纯为大火。……因其热力极大，人不能生，故太阳星君居焉。”

其余怪话还多；但讲天堂的远不及六朝方士的《十洲记》⁽⁶⁾，讲地狱的也不过抄袭《玉历钞传》⁽⁷⁾。这种童算是糟了！另外还有感慨的话，说科学害了人。上面一篇“嗣汉六十二代

天师正一真人张元旭”的序文，尤为单刀直入，明明白白道出——

“自拳匪假托鬼神，致招联军之祸，几至国亡种灭，识者痛心疾首，固已极矣。又适值欧化东渐，专讲物质文明之秋，遂本科学家世界无帝神管辖，人身无魂魄轮回之说，奉为国是，俾播印于人人脑髓中，自是而人心之敬畏绝矣。敬畏绝而道德无根柢以发生矣！放僻邪侈，肆无忌惮，争权夺利，日相战杀，其祸将有甚于拳匪者！……”

这简直说是万恶都由科学，道德全靠鬼话；而且与其科学，不如拳匪⁽⁸⁾了。从前的排斥外来学术和思想，大抵专靠皇帝；自六朝至唐宋，凡攻击佛教的人，往往说他不拜君父，近乎造反。现在没有皇帝了，却寻出一个“道德”的大帽子，看他何等利害。不提防想不到的一本绍兴《教育杂志》里面，也有一篇仿古先生的《教育偏重科学无庸偏重道德》⁽⁹⁾（甯字原文如此，疑是避讳⁽¹⁰⁾）的论文，他说——

“西人以数百年科学之心力，仅酿成此次之大战争。……科学云乎哉？多见其为残贼人道矣！”

“偏重于科学，则相尚于知能；偏重于道德，则相尚于欺伪。相尚于欺伪，则祸止于欺伪，相尚于知能，则欺伪莫由得而明矣！”

虽然不说鬼神为道德根本，至于向科学宣告死刑，却居然两教同心了。所以拳匪的传单上，明白写着——

“孔圣人
张天师 傅言由山东来，赶紧急傅，并无虚言！”（傅

字原文如此，疑传字之误。)

照他们看来，这般可恨可恶的科学世界，怎样挽救呢？《灵学杂志》内俞复先生答吴稚晖先生书^[11]里说过：“鬼神之说不开，国家之命遂促！”可知最好是张鬼神之说了。鬼神为道德根本，也与张天师和仿古先生的意见毫不冲突。可惜近来北京乩坛，又印出一本《感显利冥录》^[12]，内有前任北京城隍白知和谛闲法师的问答——

“师云：发愿一事，的确要紧。……此次由南方来，闻某处有济公临坛，所说之话，殊难相信。济祖是阿罗汉，见思惑已尽，断不为此。……不知某会临坛者，是济祖否？请示。

“乩云：承谕发愿，……谨记斯言。某处坛，灵鬼附之耳。须知灵鬼，即魔道也。知此后当发愿驱除此等之鬼。”

“师云”的发愿，城隍竟不能懂；却先与某会力争正统。照此看来，国家之命未延，鬼兵先要打仗；道德仍无根柢，科学也还该活命了。

其实中国自所谓维新以来，何尝真有科学。现在儒道诸公，却径把历史上一味捣鬼不治人事的恶果，都移到科学身上，也不问什么叫道德，怎样是科学，只是信口开河，造谣生事；使国人格外惑乱，社会上罩满了妖气。以上所引的话，不过随手拈出的几点黑影；此外自大埠以至僻地，还不知有多少奇谈。但即此几条，已足可推测我们周围的空气，以及将来的情形，如何黑暗可怕了。

据我看来，要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那种

“孔圣人
张天师”传言由山东来”的方法，是全不对症的，只有这鬼话

的对头的科学！——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学！——这是什么缘故呢？陈正敏《遯斋闲览》^{〔13〕}有一段故事（未见原书，据《本草纲目》^{〔14〕}所引写出，但这也全是道士所编造的谣言，并非事实，现在只当他比喻用）说得好——

“杨勳中年得异疾；每发语，腹中有小声应之，久渐声大。有道士见之，曰：此应声虫也！但读《本草》取不应者治之。读至雷丸，不应，遂顿服数粒而愈。”

关于吞食病菌的事，我上文所说的大概也是错的，但现在手头无书可查。也许是 Koch 博士发见了虎列拉菌时，Pfeffer 博士以为不是真病菌，当面吞下去了，后来病得几乎要死。总之，无论如何，这一案决不能作“精神能改造肉体”的例证。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补记。

注 释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署名唐俟。

〔2〕 指蒋维乔，江苏武进人，当时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他一九一四年出版《因是子静坐法》一书，提倡“静坐”。在该书《原理篇》中，有“人之根本在脐”，“丹田者亦名气海，在脐下腹部”等语。在他译述的日本铃木美山所著《长寿哲学》的《病之原因》一节中，引用了德国“科布博士”（即科荷博士）吞食细菌的事，来证明“霉菌进入人身，而精神正确时，决不成病”，把精神的作用夸张到荒谬的程度。

〔3〕 Koch 博士 即科荷博士（1843—1910），德国病菌学家。